

# “改写理论”视域下的翻译文化过滤现象

## ——以庞德英译《送孟浩然之广陵》为例

顾芳

兰州交通大学外国语学院, 甘肃 兰州

收稿日期: 2026年5月15日; 录用日期: 2026年6月29日; 发布日期: 2026年7月8日

### 摘要

安德烈·勒菲弗尔的“改写理论”指出, 翻译并非在真空中进行的语言转换, 而是深受意识形态、诗学观念与赞助人力量影响的文化重构过程。本文以埃兹拉·庞德英译李白诗作《送孟浩然之广陵》为案例, 以安德烈·勒菲弗尔的“改写理论”为指导, 从意识形态、诗学与赞助人三个维度深入分析“文化过滤”现象。庞德英译本在意识形态层面隐去儒家思想与地名文化, 在诗学层面借助意象派美学重塑唐诗意境, 在赞助人层面回应时代需求以驱动翻译策略, 庞德译本中体现出显著的文化过滤特征。文化过滤是译者在特定历史文化语境中主体性发挥的能动体现, 既可能导致文化信息的损耗与变形, 也可能在目的语文化中催生新的美学价值与文化意涵。正视并理性分析文化过滤现象, 对深化跨文化传播理解、丰富翻译批评维度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

### 关键词

改写理论, 文化过滤, 庞德, 《送孟浩然之广陵》, 意识形态, 诗学, 赞助人

# The Phenomenon of Cultural Filtering in Transl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Rewriting Theory*

## —A Case Study of Pound's English Translation of *Separation on the River Kiang*

Fang Gu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Lanzhou Jiaotong University, Lanzhou Gansu

Received: May 15, 2026; accepted: June 29, 2026; published: July 8, 2026

## Abstract

André Lefevere's *Rewriting Theory* posits that translation is not a mere linguistic transfer conducted in a vacuum, but rather a process of cultural reconstruction profoundly influenced by ideology, poetics, and patronage. This paper takes Ezra Pound's English translation of Li Bai's poem *Seeing Meng Haoran Off at Yellow Crane Tower* as a case study. Guided by Lefevere's *Rewriting Theory*, it conducts an in-depth analysis of the phenomenon of "cultural filtering" from three dimensions: ideology, poetics, and patronage. At the ideological level, Pound's translation obscures Confucian thought and place-name cultures; at the poetic level, it reshapes the imagery of Tang poetry through the lens of Imagist aesthetics; at the level of patronage, it responds to the demands of the era to drive translation strategies. Pound's translation exhibits notable characteristics of cultural filtering. Cultural filtering is a dynamic manifestation of the translator's subjectivity within a specific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context. It may lead to the loss or distortion of cultural information, but it can also generate new aesthetic values and cultural meanings within the target language culture. Recognizing and rationally analyzing the phenomenon of cultural filtering holds significant theoretical importance for deepening the understanding of cross-cultural communication and enriching the dimensions of translation criticism.

## Keywords

Rewriting Theory, Cultural Filtering, Pound, *Separation on the River Kiang*, Ideology, Poetics, Patronage

Copyright © 2026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Open Access

## 1. 引言

翻译的本质远非单纯的符码转换。安德烈·勒菲弗尔(André Lefevere)所提出的“改写理论”明确指出翻译行为始终受到意识形态、诗学观念及赞助人力量等多重因素的制约与塑造[1]。在这一理论框架下,翻译被视作一种具有明确目的性与操控色彩的“改写”实践。译者并非透明的语言中介,而是在特定历史文化语境的规约下,对源语文本进行有意识的筛选、调整乃至重构。在此过程中,源语文化所承载的独特元素,包括价值观念、审美取向、历史典故与社会习俗等,在进入目的语文化系统时,必然经历译者的解读、筛选、改造或删减。这种因翻译转换而导致的文化信息流失、变形或被目的语文化规范同化的现象,即为“文化过滤”。改写理论为理解翻译的本质提供了宏观视野,而文化过滤则构成其核心运作机制。

“文化过滤”由朱利安·豪斯于1977年首次提出,指涉翻译过程中因文化差异产生的信息筛选机制[2],在翻译研究领域,豪斯区分了显性翻译与隐性翻译,并引入“文化过滤”作为译者补偿文化特异性的手段[3]。近年来,这一概念持续引发学界关注。国内研究主要集中于比较文学领域,翻译研究范畴内尚缺乏系统的理论建构;且多聚焦于小说文体,对诗歌的观照明显不足。本文尝试在此研究现状上有所推进,将文化过滤的分析系统地引入中国古典诗歌英译领域,并与勒菲弗尔的改写理论进行深度整合,旨在探究译者主体性在多重规范制约下对文本进行筛选与重塑的具体机制。与既有研究多侧重单向维度分析不同,本文强调意识形态、诗学与赞助人三个维度在翻译决策中的协同作用,力图提供一个更为立

体的解释框架。比较文学与翻译研究的交叉成果表明，文化过滤的发生根植于“文化场”的动态运作——原文本受意识形态、历史语境等因素影响，通过“文化场”产生语义“折射”[4]。这一机制与巴斯内特、勒菲弗尔提出的“文化转向”形成理论呼应，其“折射文本”概念揭示翻译作为文化间意义重构的本质。勒菲弗尔认为，所有改写皆反映特定意识形态与诗学，文化过滤是目的语文化对原文的策略性重构，推动翻译研究从语言转换向文化权力运作的范式转型。他的观点为文化过滤提供了改写理论视角下的阐释框架。从改写理论视角来看，文化过滤是导致原文改写的重要动因，使译者在翻译时对原文进行增删调整，实现文化信息的变形传递。20世纪初美国诗人埃兹拉·庞德对中国古典诗歌的翻译，为观察文化过滤提供了典型案例。庞德虽不精通汉语，却凭借费诺罗萨遗留的笔记及其意象派诗学的直觉，对李白诗作进行了“创造性”英译。其《华夏集》(Cathay)在英语世界取得巨大成功，深刻影响了现代英语诗歌的发展，然而其成功背后是以对源语文化内涵的诸多过滤为代价的。李白《送孟浩然之广陵》的庞德译本，正是这种文化过滤现象的集中体现。

本文以勒菲弗尔改写理论为分析框架，聚焦庞德英译《送孟浩然之广陵》(“Separation on the River Ki-ang”),从意识形态、诗学与赞助人三个维度剖析其翻译过程中的文化过滤现象。通过原文与译文的对比解读，揭示庞德如何基于自身文化立场、诗学理念及时代语境对原诗进行选择性改写与重构，进而探讨文化过滤的本质特征、动因及其在跨文化传播中的复杂效应。

## 2. 勒菲弗尔改写理论的核心维度与文化过滤

勒菲弗尔的改写理论为理解翻译活动的社会文化属性提供了强大工具。该理论的核心在于揭示了操控翻译行为的三大关键要素，即意识形态、诗学与赞助人，而文化过滤正是这一操控在文本层面的具体呈现。“文化过滤”这一术语最早由金丝燕提出并展开初步探讨。通过分析1915至1925年间中国译者对法国象征主义诗歌的接受状况，她指出接受者会依据自身的文化框架进行有意或无意地选择，这一框架即发挥着过滤作用[5]。翻译行为的三大要素分别构成文化过滤的价值导向、形式准则与外部驱动力，共同决定源语文化信息的筛选、改造与重构方向。同时改写理论为文化过滤提供了深层解释框架，文化过滤则为改写理论提供了可操作的分析路径，二者结合使翻译研究从语言转换层面向文化权力运作层面实现范式转型。

### 2.1. 意识形态

翻译中的意识形态研究可追溯至多元系统理论。埃文-佐哈尔与图里的理论探索，为后续研究开辟了道路。受此启发，勒菲弗尔于1981年提出“折射文本”概念，指出翻译并非简单的语言转换，而是为契合特定读者需求、迎合特定诗学理念或意识形态倾向而精心加工的文本形态[6]。在勒菲弗尔的改写理论框架中，意识形态并非狭义的政治信仰，而是泛指“制约我们行为的观念、信仰和价值观体系”。它界定了何为可接受、何为“好”、何为“真实”、何为“正常”，涵盖政治立场、道德观念、宗教信仰、性别观念、社会等级等诸多层面。在翻译语境中，意识形态体现为译者、赞助人及目标读者所处社会文化语境构成的宏观背景，犹如一道过滤器，决定源语文本中哪些内容可以被接受和传播，哪些需要规避、修改或删减。这种过滤可能源于目的语文化的主流价值观、审查制度，亦或译者个人的信念立场，最终表现为对原文主题、人物形象及特定表述的增删或软化处理。

文化过滤在意识形态维度的运作，集中体现为目的语文化对源语文本中有悖于或挑战其主流意识形态的文化观念、社会规范或政治立场的有意识规避与改造。译者可能强化原文中符合本土价值观的元素，同时弱化或删除与之相悖的内容。这一过程并非单纯的语言转换，而是目的语文化的主流意识形态对源文本进行审查、筛选与重塑，以确保改写后的文本不背离目的语文化的主导价值观与信仰体系。

## 2.2. 诗学

诗学概念源自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原指关于文学形式与文学话语的理论体系。威利斯·巴恩斯通进一步将其拓展为四个维度：艺术形式问题、翻译分类或变体、翻译理论与方法，以及各理论流派中的诗学观点[7]。在勒菲弗尔的改写理论框架中，诗学包含两个核心层面，其一为“文学技巧库”(inventory of literary devices)，即特定文化中通行的体裁、主题、象征、格律、风格等具体文学手法；其二为“文学功能观”(concept of the role of literature)，即关于文学在社会系统中应扮演何种角色的观念。

翻译研究中的诗学范畴涵盖诗学形式、诗学变体、诗学观点、诗学理论、诗学方法及诗学功能等多个维度。在翻译实践中，译者通常会依据目的语文化的主流诗学规范对原文进行重构，以迎合目的语读者的审美期待。为使译文被接受并融入目的语文学系统，译者往往会调整源语文本的文学形式、改变修辞风格、甚至替换文化意象。

## 2.3. 赞助人

赞助人指“任何能够促进或阻碍文学阅读、写作和改写的权力”。其主体形态多元，既可表现为具体个人(如君主、出版商)，亦可为机构组织(如国家机器、学术机构、媒体集团)，乃至抽象力量(如市场、公众趣味、意识形态潮流)。赞助人通常通过三种途径施加影响，包括控制经济收入、赋予社会地位以及提供意识形态合法性。其权力运作直接决定哪些作品被翻译、由谁翻译、以何种形式呈现，以及译本能否顺利进入目的语文化系统。赞助人的需求与偏好构成译者改写行为的直接外部驱动力。出于利益考量，赞助人会直接或间接地要求译者对源语文本进行符合其预期的调整，这种权力关系深刻主导着翻译实践的走向，往往成为文化过滤现象发生的直接诱因。

文化过滤在赞助人维度的运作，集中体现为，译本的选择与呈现方式均受到赞助力量(如出版要求、市场需求、政治导向)的强力塑造。赞助人通过设定翻译选题、规范译本形式、把控传播渠道等方式，使翻译活动服务于特定利益诉求，进而导致源语文本在进入目的语文化系统时经历有目的的筛选与改写。

## 3. 庞德英译《送孟浩然之广陵》中的文化过滤现象

李白《送孟浩然之广陵》一诗，语言凝练，意境开阔，情感真挚，是唐代送别诗的典范，原文如下：

故人西辞黄鹤楼，烟花三月下扬州。

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

《送孟浩然之广陵》创作于公元725年左右。当时李白寓居安陆期间，结识了比他年长十二岁的孟浩然。孟浩然是李白非常敬仰的前辈诗人，两人志同道合，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后来，孟浩然要去广陵(今江苏扬州)，李白在黄鹤楼为其送行，于是写下了这首千古名诗，以表达对友人的不舍之情和对其旅途的美好祝愿，同时也流露出淡淡的离愁别绪。诗人巧妙地将依依惜别的深情寄托在对自然景物的动态描写之中，意境开阔，情感真挚，余味无穷。

庞德的英译本，译文如下：

### Separation on the River Kiang

Ko-jin goes west from Ko-kaku-ro,

The smoke-flowers are blurred over the river.

His lone sail blots the far sky.

And now I see only the river, the long Kiang, reaching heaven. [8]

通过对比分析原文与庞德译文，可以清楚地看到改写理论三大操控力量在留下的文化过滤的痕迹。

### 3.1. 意识形态操控下的文化过滤

第一，儒家伦理情感的符号化淡化。原诗首句“故人西辞黄鹤楼”中的“故人”，是承载深厚儒家伦理内涵的文化符号，它不仅指涉“老朋友”，更蕴含着基于长期交往与互相信任的情感厚度，体现了传统中国社会重视人伦、珍视友情的人际关系模式。庞德将其音译为日语读音“Ko-jin”，而非英语中能传递情感分量的“old friend”或“dear friend”。这一处理在很大程度上将富含伦理意蕴的称谓简化为异域符号，可能无意识地过滤掉了“故人”所承载的儒家友情观与历史交往深度。对英语读者而言，“Ko-jin”仅指向一个遥远的东方形象，难以唤起对那份深厚情谊的文化共鸣。同样，“黄鹤楼”被音译为日语读音“Ko-kaku-ro”，剥离了“仙人乘鹤”的道教典故内涵，可能沦为空洞的地理符号。这种过滤或许反映出庞德在翻译时更倾向于追求一种音韵上的异域感和陌生化效果，而非传递原词的文化内核，也可能受限于其参考的费诺罗萨笔记的注音方式。

第二，历史地理信息的模糊化处理。“烟花三月下扬州”中的“扬州”，在唐代语境中是繁华的东南都会，象征着财富、文化与享乐，是承载特定历史记忆与地域身份的文化符号。“下扬州”本身即暗示一段令人向往的风雅旅程。但庞德译文将“下扬州”完全略去，代之以模糊的场景描述“The smoke-flowers are blurred over the river”。这一关键地名的过滤，导致英语读者无法知晓友人的去向，更无从体会“扬州”所蕴含的繁华意象及其与“烟花三月”共同营造的风流逸韵。地名文化作为重要的文化身份标识与历史记忆载体，在此被有意无意地抹去，这种过滤，一方面可能源于庞德对唐代中国地理文化知识的缺乏，另一方面也在某种程度上体现了他更关注营造一种整体的、朦胧的、情感化的画面，而非传递具体的历史地理信息。

第三，道家自然观的宗教文化框架转换。原诗尾联“唯见长江天际流”呈现的是李白对友人的客观凝视，是一种超然的物我观照，隐含道家天人合一、融入自然的哲学意蕴。庞德却加入主观视角，将诗意在一定程度上转为抒情主体的孤独感，契合西方浪漫主义传统对个人情感的强调。更为关键的是，他将“碧空尽”“天际流”译为“far sky”与“reaching heaven”，而“heaven”一词在西方文化语境中极易唤起基督教的天国意象，这与道家自然哲学中“天”的宇宙论内涵存在本质差异。这一改写使原诗的道家意蕴在目标语读者的接受过程中可能被消解，取而代之的是西方读者的宗教认知框架，实现了文化观念的深层过滤与重构。

### 3.2. 诗学操控下的文化过滤

庞德英译《送孟浩然之广陵》在诗学维度呈现出三重文化过滤机制，具体表现为复合意象的碎片化拆解、空间意境的视觉化重构以及诗歌形式的本土化改造。

第一，复合意象的碎片化拆解。原诗“烟花三月下扬州”中“烟花”二字极其精妙，是雾霭中的花，指春景，融合了视觉(如烟的柳絮、繁花似锦)、触觉(春日氤氲的水汽)乃至听觉(花团锦簇的热闹想象)，共同勾勒出一幅迷蒙艳丽、充满生机的江南春日胜景。这一意象既点明时节，又烘托出离别背景中蕴含的繁华与希望。庞德作为意象派领袖，将这一复合意象拆解为“The smoke-flowers are blurred over the river”。其中，“smoke-flowers”是对“烟花”的直译式拆解，将原词一分为二，过滤掉了中文“烟花”作为有机整体所特有的通感魅力。同时，“blurred”一词的加入，虽营造出朦胧的视觉效果，符合意象派追求瞬间视觉印象的美学准则，却彻底改变了意象的情感基调，原句的明丽繁盛被置换为阴郁消沉，宛若印象派画作中的忧郁风景。庞德以符合意象派诗学标准的“硬朗”“精确”的视觉意象，取代了原诗融合多重感官体验的复合意象，实现了诗学观念驱动下的文化意象过滤与再造。

第二，空间意境的视觉化重构。原句“孤帆远影碧空尽”以宏阔空间衬托微小的孤帆远影，营造出强烈的空间纵深感和绵延无尽的怅惘之情。“孤”“远”“碧”与“尽”共同构成一个立体、动态、充

满离情别绪的意境。庞德译为“His lone sail blots the far sky”。首先，“blots”是一个带有强烈主观负面色彩的动词，与原文相对客观的视觉描述“尽”截然不同。“blots”将诗人个人的伤感情绪强行注入画面，一定程度上过滤掉了原句通过空间对比自然流露的含蓄深沉的离思。其次，原句的层次感被简化为“lone sail blots the far sky”这样一个相对平面化的意象叠加。庞德抓住“孤帆”与“天空”两个视觉元素，赋予其强烈的动态关系，符合意象派对意象鲜明性与动态呈现的追求，但过滤掉了原句通过空间纵深感和渐进式消失所营造的绵长韵味与悠远意境。诗学策略的取舍导致文化审美体验的深层转换。

第三，诗歌形式的断裂与美学本土化。原诗作为七言绝句，具有规整的格律，四句之间起承转合、气韵流畅。庞德彻底抛弃这一形式规范，代之以自由诗体，将原诗四句拆解为四行相对独立的画面意象，使李白特有的流畅气韵在译文中流失，呈现出一种意象并置的现代美感。与此同时，庞德刻意保留“Kiang”“Ko-jin”“Ko-kaku-ro”等音译词，通过引入异域语音符号制造一种遥远的“异域感”；但另一方面，他又借助英语语法结构和意象派惯用的静态画面拼贴手法，将这些异质元素纳入现代英语诗歌的审美框架。这一双重策略既回应了20世纪初英美诗坛对非西方诗学资源的好奇与借鉴需求，又将中国古典诗歌的意境进行了本土化改造，这种文化过滤使译文更符合西方现代主义诗学的表达范式。

### 3.3. 赞助人影响下的文化过滤

庞德英译《送孟浩然之广陵》在赞助人维度呈现出三重文化过滤机制，具体表现为时代诗学革新的驱动、知识中介的隐性操控以及东方想象的消费导向。

第一，时代诗学革新的驱动。庞德翻译《华夏集》并非孤立事件，而是深植于20世纪初美国意象派诗歌运动的浪潮中。意象派诗歌反对模糊抒情与抽象说教，强调用精确、鲜明的意象直接呈现事物本身，捕捉诗人在创作时的瞬间感受。庞德作为意象派诗歌的理论家，在翻译中国古诗时具有明确的目的性，即为现代英语诗歌革新寻找灵感。中国古典诗歌，尤其是唐诗，以其高度凝练的意象、直接的语言、含蓄深远的意境，恰好契合意象派的美学追求。因此，庞德的翻译策略深受这一时代需求及其自身诗学革新使命的驱动。上文分析中，其对“烟花”“孤帆远影”等意象的处理，可被视作按意象派标准重组表达，使其成为可供英语诗人借鉴的范本。这种选择性聚焦与改造本身就是深刻的文化过滤。

第二，知识中介的隐性操控。庞德不通中文，其翻译很大程度上依赖汉学家费诺罗萨遗留的笔记。这一知识中介构成翻译过程中隐形的赞助力量，深刻影响译本的生成方向。费诺罗萨将“烟花”注释为“mist like flowers”，这或许直接启发庞德将其拆解为“smoke-flowers”并配合“blurred”营造朦胧效果；其对“故人”“黄鹤楼”等文化专有项的日语读音标注，也在相当程度上影响庞德采用音译策略而非意译处理。笔记提供者的解读框架与知识局限，实质上充当了第一道文化过滤网，预先筛选了庞德所能接触到的源语信息，进而框定其翻译选择的范围与走向。

第三，时代文化氛围的消费导向。一战前后，西方世界对自身文明的危机感加深，部分知识分子转向东方寻求精神慰藉。庞德翻译中国诗歌，也在某种意义上回应了当时西方社会对遥远东方的一种浪漫化想象。《华夏集》整体呈现的简洁、含蓄、略带忧郁的风格，正符合这种想象。这种时代氛围、读者期待与市场趣味作为一种无形的赞助力量，可能促使庞德在翻译中倾向于过滤掉过于具体或复杂、不符合当时“中国风”刻板印象的文化元素，如“扬州”的繁华信息、复杂的儒家伦理称谓，而强化那些能唤起神秘、朦胧、感伤的东方美学的元素。译本对东方意象的选择性呈现，可在某种程度上视作译者对目的语文化市场期待的策略性回应，体现了赞助人力量对文化过滤方向的引导作用。

### 3.4. 多重力量的协同作用

为更深入地理解文化过滤的运作机制，本节以庞德对“烟花三月下扬州”这一核心诗句的翻译决策

为例，探讨意识形态、诗学和赞助人三要素是如何协同作用的。这一决策并非单一因素决定，而是三者交织互动的结果。

首先，从诗学维度看，作为意象派运动的倡导者，庞德的核心目标是捕捉并再现原诗中的“意象”。原句“烟花”这一通感复合体，在庞德的美学框架下，被精确、硬朗的视觉意象“smoke-flowers”所取代，并用“blurred”一词营造出他心目中符合现代诗歌审美的朦胧画面。这是他作为诗人译者的首要关切。其次，从赞助人维度看，庞德所依赖的费诺罗萨笔记中对“烟花”的注释(“mist like flowers”)，为他提供了直接的理解素材和“权威”依据，这构成了一种知识上的赞助。同时，整个意象派运动对“东方”诗歌形式的期待，作为一种无形的市场力量，也鼓励他提炼并强化这种带有异域感和画面感的表达。最后，从意识形态维度看，将“下扬州”这一充满历史文化内涵和世俗繁华感的动态叙事，彻底转化为一幅静态、模糊的河流画面(“The smoke-flowers are blurred over the river”)，这在客观上过滤掉了原诗中的唐代社会生活气息和儒家文人“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风雅传统。这一处理，可能无意中迎合了当时西方读者对“东方”作为宁静、永恒、超脱的精神家园的想象，从而完成了一次观念层面的文化过滤。可见，“烟花三月下扬州”的翻译决策，是诗学追求、赞助人中介和潜在的文化观念预设三者合力作用下的典型例证，它们共同塑造了这一兼具创造性转化与文化信息损耗的译文。

综上所述，庞德英译《送孟浩然之广陵》中所呈现的文化过滤现象，是多重力量交织作用的必然结果。时代精神、文学运动诉求以及由此催生的读者期待等“赞助人”力量，与庞德个人的诗学理念和翻译策略选择共同塑造了译本的文化过滤形态。正如韦努蒂所言，这种翻译策略体现了译者有意识的文化干预[9]。庞德的翻译在本质上是一种有明确目的的文化重构活动，他并非致力于对中国文化原貌的忠实再现，而是借中国古典诗歌资源，服务于西方现代诗歌的美学革新，并满足特定时代背景下西方读者对东方的文化想象与精神诉求。在这一过程中，源语文本所承载的儒家伦理内涵、历史地理信息、道家哲学意蕴以及复合审美体验，均经历了不同程度的筛选、改造与重构。文化过滤既是译本生成的必然代价，也是其在目的语文化中获得成功的关键动因。对庞德译本的深入剖析，有助于揭示翻译作为跨文化实践的内在张力，它既可能造成文化信息的流失与变形，也可能在目的语文化中催生新的美学价值与文化意义。

#### 4. 文化过滤的辩证性

文化过滤是翻译过程中译者主体性在意识形态、诗学与赞助人多重力量规约下的能动实践，其本质特征与复杂效应集中体现为双重性。一方面，文化过滤不可避免地造成文化信息的损耗与变形。这种损耗与变形源于文化间的根本差异，中西方对友情、自然、离别情感的不同表达方式，以及译者受制于自身文化立场、知识局限与翻译目的所做出的选择性处理。任何翻译都无法实现文化信息的“完全透明”传递，文化过滤是翻译的必然代价，也是跨文化传播中不可避免的现实。

另一方面，文化过滤在特定条件下能够催生创造性的文化新生。它可以通过引入异质性表达激活目的语诗学潜能，打破既有文学陈规，推动目的语文学的革新与发展。其次，它能够重构源语文化形象，在目的语文化中塑造符合特定想象与需求的“他者”参照，成为新的灵感源泉。它还可以开辟跨文化对话的独特路径，以“创造性误读”为起点，将源语文化推向更广阔的国际舞台，为后续更深入的文化交流奠定基础。文化过滤在此意义上并非终点，而是跨文化意义再生的起点。评价文化过滤现象，不能脱离其发生的具体历史文化语境，而应审慎考量其所产生的实际文化效应，一个充满“误读”与“过滤”的译本，完全可能在目的语文化中取得巨大成功并产生深远影响，这正是改写理论所揭示的翻译作为文化重构力量的生动体现，翻译的意义不仅在于“忠实”与否，更在于其在目标文化系统中引发的连锁反应与再生价值[10]。

## 5. 结论

本文以勒菲弗尔的改写理论为透镜,通过剖析庞德英译李白《送孟浩然之广陵》这一典型案例,揭示了翻译过程中文化过滤现象的普遍性、必然性及其复杂运作机制。文化过滤绝非翻译的技术性瑕疵,而是翻译作为跨文化“改写”行为的核心特征。庞德的英译凸显了文化过滤的双重本质,它既不可避免地导致源语文化信息的损耗与变形,又在特定历史契机与译者创造力的作用下,成为文化创新的催化剂,成功激活了英语诗歌的表现潜能,塑造了西方视野中的中国诗歌形象,成为连接东西方文学的重要桥梁。

本研究的启示在于,翻译研究应超越“忠实”与“背叛”的二元对立,将译本置于具体历史文化语境中,分析其文化过滤的动因、表现及复杂效应。译者作为文化过滤的主要执行者,应增强文化敏感性与理论自觉,对过滤尺度做出审慎的选择;跨文化理解需对“过滤”后的文化形象保持清醒认识,寻求多层次的交流方式以弥补翻译的局限。正如杨仕章所言,翻译是文化保护主义前提下的文化交流,只有经过文化过滤,译作才有可能成为真正的译语文化产品。

## 参考文献

- [1] Lefevere, A. (1992) *Translation, Rewriting, and the Manipulation of Literary Fame*. Routledge.
- [2] House, J. (1977) *A Model for Translation Quality Assessment*. Gunter Narr.
- [3] House, J. (2015) *Translation Quality Assessment: Past and Present*. Routledge. [https://doi.org/10.1057/9781137025487\\_13](https://doi.org/10.1057/9781137025487_13)
- [4] 乐黛云. 跨文化对话(第7辑)[M]. 南京: 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4.
- [5] 金丝燕. 文学接受与文化过滤[M].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94.
- [6] Lefevere, A. (1981) *Refracted Texts. Poetics Today*, 2, 39-55. <https://doi.org/10.2307/1772484>
- [7] Barnstone, W. (1993) *The Poetics of Translati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 [8] Pound, E. (1915) *Cathay*. Elkin Mathews.
- [9] Venuti, L. (1995) *The Translator's Invisibility: A History of Translation*. Routledge.
- [10] Bassnett, S. and Lefevere, A. (1990) *Translation, History and Culture*. Pinter.